

石广权的《明耻篇》与毛泽东的《题〈明耻篇〉》

陈扬桂

石广权是邵阳潭溪(今属新邵县)人,与蔡锷的老师樊锥同为晚清拔贡,相互间有同乡、同年、同学的“三同”之谊。戊戌变法时,石广权和樊锥积极参与梁启超、谭嗣同、熊希龄等人倡导的维新活动。变法失败后,石广权隐匿于家乡的山野之中,才免于难。1900年,因参与唐才常领导的汉口起义,石广权受到追缉,避难上海。在蔡锷资助下,石广权留学日本,加入同盟会,改名“苍石”,昭示坚如苍石的反清之志。归国后,石广权与人创办邵阳驻省中学,在湖南一师、湖南大学等校任教,并兼船山学社社长,组织湘学会,继续从事反清斗争。袁世凯称帝,蔡锷在云南起义,石广权协助湖南督军刘人熙响应反袁。

石广权擅写诗文,长于演说,船山学社改组后,被推为讲演部主任。日寇入境后,他年事已高,未随湖南大学西迁,任教于省立六中(邵阳市一中前身),常在学校集会上作讲演报告,教育学生要向邵阳的三个名人——魏源、江忠源、蔡锷学习,立大志,干大事。

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求学时,石广权任教该校。当时,袁世凯为“复辟帝制”当皇帝,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“二十一条”密约,激起全国爱国人士的愤怒,掀起了一场反袁浪潮。“二十一条”签订后,石广权痛心疾首,一连写了7篇时政文章,介绍这一事件的起因、经过,以及对国家安全的严重影响。文章在一师传播后,反响很大,学校师生集资汇印成《明耻篇》一书。毛泽东读到《明耻篇》后,大受震撼,写了一首四韵诗:“五月七日,民国奇耻。何以报仇?在我学子!”

诗开篇写的“五月七日”,是因为中国在五月七日接到日方的“最后通牒”,要求袁世凯必须在两天之内,就日方的要求作出答复。因此,国人视这一天为“国耻日”。毛泽东在诗的最后注明,这首诗是因为他读了学校教习石广权集资刊印的书籍《明耻篇》而作。随后,毛泽东连书带诗一起寄给友人湘生,并附言:“又《明耻篇》一本,本校辑发于中日交涉,颇得其慨,阅之终篇,亦可得新知于一万也。”意思是说,石广权的这部《明耻篇》,抓住了当时中日外交问题中的关键,阅读全文不仅可以了解时事政治,对于拓展知识面也有帮助。

在这之前,毛泽东写过杂言诗《迎春》、五言诗《并赞》、七绝《咏蛙》和七绝《呈父亲》。然而,这几首诗基本上是改写民间歌谣或他人诗作。在某种意义上来说,《四言韵语·题〈明耻篇〉》算是毛泽东的第一首诗。毛泽东一生留下的诗词手迹比较多,这首《四言韵语·题〈明耻篇〉》的手迹,是他留下的最早的诗歌手迹。(陈扬桂,隆回人,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、湖南省作协会员)

◆ 思想者营地

桑蚕琐谈

刘绍雄

我国是世界上最早掌握人工养蚕和丝绸织造技术的国家。随着“丝绸之路”开通,“蚕”声名远扬,中国丝绸开始源源不断地向外传播,全方位展示它的魅力。丝绸一度成为东方文明的代名词。以丝绸为主的商品贸易,促进了东方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广泛交流。

上世纪二十年代,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了半个蚕茧。1973年,浙江余姚的河姆渡遗址又出土大量纺轮、打纬刀、骨针等纺织工具。1983年,荣阳青台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瓮棺时,在瓮棺中头盖骨的附着物和瓮棺底的土样取样中,检测到距今5000多年的桑蚕丝残留物。从河洛地区双槐树遗址出土的象牙雕蚕、与青台遗址等周边地区同时期遗址出土的丝绸遗存,可见5300年前的河洛地区,先民们不仅关注蚕,还关注蚕丝,且已经开始人工养蚕、并学会缂丝织造丝绸。

“桑”作为一种自然界的物种,被神化成了“扶桑”。《山海经·海外东经》云:“汤谷上有扶桑,十日所浴,在黑齿北。”《海内十洲记》曰:“多生林木,叶如桑。又有槿,树长者二千丈,大二千余围。树两两同根偶生,更相依倚,是以名为扶桑也。”我国古代发明创造往往附会到名人身上,桑蚕丝的发明也不例外。关于蚕的起源,“伏羲化

蚕”的传说,更为蚕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。《皇图要览》中就有“伏羲化蚕,西陵氏始蚕”的记载。而黄帝轩辕氏作为中华文明的先祖,其正妻嫫祖也被推举为发明缂丝养蚕第一人。“嫫祖祭典”一直是西平县人们的民俗活动,于2007年2月被公布为河南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《诗经》305篇,与桑蚕有关的就有27篇之多。《小雅·南山有台》曰:“南山有桑,北山有杨。”《豳风·七月》曰:“蚕月条桑,取彼斧斨。以伐远扬,猗彼女桑。”可见最迟在周代,养蚕缂丝业已经相当发达与普遍。而与《孔雀东南飞》齐名的汉乐府民歌《陌上桑》,便是以桑蚕业为主题的叙事诗:“秦氏有好女,自名为罗敷。罗敷喜蚕桑,采桑城南隅……”唐及以后,与桑蚕有关的诗层出不穷。

公元前3世纪,荀卿就在其所著的《蚕赋》中提到,蚕“夏生而恶暑,喜温而恶雨”,体现了古人对蚕生活习性的认识。而到了三国西晋时期,杨泉也写了《蚕赋》:“温室既调,蚕母入处。陈布说种,柔得和所。晞用清明,浴用谷雨……”将蚕的习性更加科学地总结出来。汉代以来,许多农书,如《齐民要术》《农政全书》《记胜之书》中,都对种桑养蚕进行专章论述。

(刘绍雄,武冈人,湖南省作协会员)

云山摩崖石刻“白玉泉”

阿旧

云山,在武冈城南十里。自麓至顶,盘踞而上十余里,峰峦簇峙,有“起云洞”,终日云雾缭绕,故称云山,所谓“山以云名云即山,云生山头山埋云”。古为湖南四大名山之一,隆庆《宝庆府志》称“为州雄峙第一景”,道书《数斋威仪经》载为全国“七十二福地”中的第六十九福地,古来官员文士题咏留刻甚多。1997版《武冈县志》记载,在云山北侧的“第十八弯”中段,有摩崖石刻“白玉泉”三字,篆书,落款:“万历己卯白下杨一州、郡人张继志、山禅海量立。”县志对落款未有注解。

万历己卯,为万历七年(1579)。杨一州,即杨一洲,字伯海,明代画家。明周晖《金陵琐事》载杨一洲曾寄谢榛山水图,谢榛答谢渙美曰:“画逼辋川工,王维信可同。”谢榛(1495-1575),明代布衣诗人,《明史》有传。

《明画录》载杨一洲为诸生,“有声山水,小幅绝佳”。又称其喜游历,“足迹遍五岳,故笔墨具灵秀之气”。明周晖《金陵琐事》亦载杨一洲喜游历,“游名山足迹,几遍五岳。人讥之云:‘伯海手不如脚。’”明《耳谈类增》亦云,“杨(一洲)嗜游,足迹通天下,称‘铁脚’”,为此放弃功名进

取,“饘于山水……可谓真隐”。云山乃湖湘名山,杨一洲不来此一游,怕是万难甘心的。

《明画录》和明《画史会要》俱称杨一洲为扬州人,其实他只是寓居扬州,本是南京人。《金陵琐事》记其事,《耳谈类增》直称“金陵杨一洲”,又此“白玉泉”落款“白下杨一州”,足证杨一洲实为南京人。金陵、白下,皆南京别称。

张继志,武冈人,康熙、嘉庆等各版《武冈州志》都称其为“儒生”,《湖广通志》称其为“荐举”,光绪《湖南通志》说他“隆庆中举”,莫衷一是。不过以上方志都说他“善诗文”,淡泊名利,为山林隐逸之士。嘉庆《武冈州志》载,明隆庆中,朝廷征召天下山林隐逸之士,本地官府上报了他的名字,他坚辞不去。有大官请他担任儒官,敦请乡饮,“亦不赴,布衣终身”。其《瑞芝赋》云,“曰余倥偬以侘傺兮,杂蒿艾而何妨也……抱灵芝而老死兮,终吾生以徜徉也”,似乎是对他为何甘隐不仕的回答。据内文,《瑞芝赋》当作于明隆庆壬申(1572)。

光绪《武冈州志》还载有张继志《宝方山共饮》《仙院》《南山》《一瀑飞涛》

《云山》等诗,皆为吟咏本地名胜之作。其中,宝方山即法相岩;仙院,在武冈城北同保山麓,又名仙人庵;南山,在城南十里,昔有南山寺;一瀑飞涛,为“云山十景”之一。

云山昔为道家圣地,后又成佛教名山。据传,唐高僧全真(无量寿佛)曾居云山。宋嘉定年间,僧人法泰因救赐“佛性”,在云山弘法,得知军汪立中之助重修胜力寺,又建观音阁、玉虚宫、真人祠。元代遭兵燹,明成化年间志惠重建胜力寺。嘉靖壬寅(1542)知州王暄建万寿宫于真人祠后。万历年间,高僧无涯主持胜力寺,云山一时高僧云集,香火鼎盛。明末有南岳高僧燕居德申禅师长住胜力寺讲经。《五灯全书》又载武冈云山有浑朴圣、云树知、十虚竺诸禅师。海量,应是云山某寺庙禅师,但以上均未载云山有禅师为海量者。金陵杨一洲远道而来,本地文人张继志尽地主之谊陪同,海量作为山僧,当为向导。

云山有“一瀑飞涛”等十景,“白玉泉”并不在其中。可见,这是“铁脚”杨一洲等三人新探得之美景,特摩崖以志之,惜后世少有人知。

(阿旧,新宁人,文史学者)



云海 鄒國華 攝

◆ 煮酒论史

陈与义写过“都梁十景诗”吗?

杨运焰

陈与义,河南洛阳人,字去非,号简斋。北宋末年,遭靖康之变,陈与义来到武冈紫阳山下(今属邵阳县金称市),客居八个月,后北上赴任。陈与义客居期间及来去武冈紫阳山的途中,写下了不少诗作,不但为后人留下了难得的文学遗产,更留下可贵的史学遗产。以致不同时期的《武冈州志》理所当然地将他的诗作收入,其中就有以他的名义咏武冈十景的诗。然陈与义真的写过咏武冈十景的诗吗?

从地理上来说,武冈十景地点,仅“宣风雪霁”和“武陵春色”二景在武冈城内,“济川回舟”和“法相洞天”在城郊,其他景以城为中心,向四面辐射。离得最近的“云山清晓”“古山瀑布”和“渠渡晴岚”,各离城有十几里,远的如“枫门落照”在现在的城步境内,“龙潭夜雨”在现在的洞口县境内,离武冈城百数十里。陈与义所客居的地方,虽属武冈(现属邵阳县),其实离武冈城还有百把里的距离。在他的诗集中,有两首题目以《入城》的诗,说明在他八个月客居武冈时,至少有过两次“入城”的经历。前诗写到:“竹舆声吽呀,路转登高原。”说明他是坐着竹制的轿子,请人抬到城里去的。后者开篇即写“舳舻沂溪来,款段踏山去。”沂者,逆也。款段,骑马缓行之状。诗中后又写道:“入城缘底事,要识崎岖路。”可见出行不易。试想,

当时陈与义所处之时,兵荒马乱。也正是因为乱,他才无可奈何,投亲来到武冈客居八个月。客居中,“入城”都如此不易,还能来到了武冈城以后,再以武冈城为轴心,以充裕的时间,克服道路的崎岖,逐一到各景点游玩吗?

据中华书局出版的《陈与义集》前言所载,陈与义死后4年,他的学生周葵就将他的诗结集出版。但诗集中却没有一首写武冈十景的诗,是偶然的疏忽,还是事出有因?

南宋时,有人根据武冈本和其他刻本增注补充,辑编出版了《简斋集》,其中也没有一首写武冈十景的诗。究其原因,武冈籍著名史学家周清澍先生考证:“追溯《简斋集》源流,今存南宋胡榘笺注本和《须溪先生评点简斋先生诗集》两种。后者曾参考‘武冈本’,补充了有关武冈的诗篇。既然南宋时武冈已刻印《简斋集》,岂有不知简斋《十景诗》并遗漏之事。胡榘的笺注对简斋生平及交往亲友考其本末,并作勾勒生平大概的年谱。《须溪评点本》补收简斋寓居紫阳山区的诗和《书堂石室铭》……与其他史料一致,皆无反映与义曾到武冈城和写《十景诗》的痕迹。”

清乾隆《武冈州志》、康熙《武冈州志》,却收入了冠名陈与义的“都梁十景诗”。清嘉庆二十二年所编辑的《武冈州志》,虽然照录,但在作者陈与义名下,加

了一个简短的说明:“按简斋诸作,多浅人伪托,以旧志相沿已久,不便删也。”这“多浅人伪托”“不便删”是添足之语吗?清光绪《武冈州志》,同样收入了这十首诗,作者名依然标注为陈与义,但删去了“不便删”这段说明,以致后人未能前后细察,也就不难怪了。

我国当代著名学者李一氓在他所著的《一氓题跋》中,曾写过一篇谈“西湖十景”的文章,他说:“按苏堤成于北宋,定苏堤春晓,当在此后。”李一氓又推论,西湖十景,当逐渐形成于南宋中晚期……杭州作为都城之后才有这“十景”名称的出现。随后,各地照本画符,打造出“十景”或“八景”。武冈亦然。

更何况,武冈十景中有一景“宣风雪霁”,史书中皆认定为宋理宗赵昀早期任邵州团练使时所题,没有他,就没有这一景的定位。陈与义生于1090年,赵昀出生于1205年,赵比陈整整晚了一百余年才出生。赵出生前还没有“宣风雪霁”这一人文风景,陈与义却早已撰写了关于“宣风雪霁”的诗,这可能吗?

(杨运焰,邵阳市政协文史研究员)

